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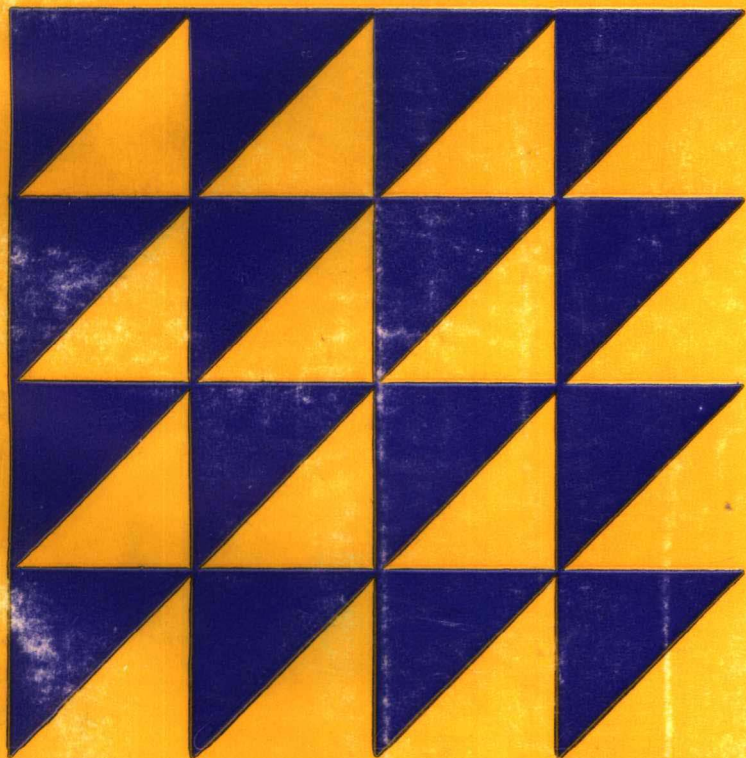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系统

——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美]伯顿·R·克拉克 著

王承绪 徐辉 殷企平 蒋恒 译

王承绪 校



杭州大学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 12 号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Burton R. Cla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83

高等教育系统

——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美] 伯顿·R. 克拉克 著

王承绪等 译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34 号)

*

浙江星邦信息处理电脑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良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58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81035-634-8/G · 158

定 价: 7.80 元

伯顿·R. 克拉克教授为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中文版作的序

本书原版于1983年问世，当时想把它作为基本的比较教育专著，帮助建立思想范畴，分析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为了写这本书，我花了10年时间出国研究，了解10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状况，这些国家主要在欧洲，又限于欧洲。1977年，在我选定工作、信念和权力三个主要特征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要素以后，开始撰稿，历时近五载。我并不认为我会再度从事这样全面的写作：有这么一次就够了。

本书出版10年之后在很多国家仍被采用，说明它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我感到高兴。西欧的一些跨国研究工作者继续有效地采用本书的分析范畴。1991年的西班牙文版最近在拉美国家为广大读者广泛使用。本书中文版的刊行将极大地扩大本书所能及的范围。在中国和其他许多以中文为主要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有很多专家和学者，他们迅速成为渴望了解别国高等教育并能从事有意义的比较分析和评价的日益扩大的国际学术界和行政官员的一部分。我深切感谢王承绪教授为准备本书中文版从而极大地提高本书的使用率所作出的周密考虑和巨大努力。

有很多在90年代早期可以得到的新的资料，在80年代早期是无法得到的，或者，即使可以得到，我并未掌握。因此，本书特别缺乏发展阶段较最发达的工业国低的国家的详尽的经验性资

料。但是，本书内容还是过分复杂而不是过分简单。我认为本书的用处不决定于纯经验材料的准确性，而决定于把这些材料有联系地、有系统地归类的概括性的范畴。因此，如果我要根据 80 年代新的知识对本书作必要的扩充，我将强调更好地突出若干范畴，更充分地组织到本书的论证中去。第一是关于学术专业的性质。我在 1987 年出版的两本专著中试图对这个问题有所发展：一本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出版的对美国学术专业的研究——《学术生活》(The Academic Life)；另一本是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跨国研究——《学术专业》(The Academic Profession)。第二就是实际进行科研活动、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的地方即大学和学院内部的“基本单位”的性质。我已经在 1988 年开始和五个国家（德、英、法、美、日）的同事对科研组织和研究生院教学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有于 1993 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基础》(The Research Foundations of Graduate Education)和尚待出版的手稿《探究的场所》(Places of Inquiry)。对于上述研究，本书乃是我进行概念化和分析的模式出发点。我希望这对读到中文版的学者将证明同样有用。

Burton Clarke
February 1994

译者序

本书于1983年初版，是比较高等教育的一部名著。著者伯顿·R. 克拉克教授，历任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高等教育和社会学教授、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从60年代开始，他的研究小组系统地研究了英、美、法、联邦德国、意大利、瑞典、日本、加拿大、波兰、南斯拉夫、墨西哥和泰国等10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分析范畴，再先后花了5年时间写成本书。原书出版以来，为各国广泛采用。英国出版了普及本，西班牙文版于去年出版，行销拉美各国。日文版即将问世。

克拉克教授曾于1987年来我国访问，在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讲授比较高等教育。本书和他的另一本专著《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中文版用《高等教育新论》书名），历年来都作为比较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要参考书。我们翻译的《高等教育新论》和他的《学术权力》两书，深得我国高教界的好评。

克拉克教授从组织的观点把高等教育系统看作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从高等教育内部揭示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以工作、信念和权力三者为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并据以分析高等教育运行的规律。他认为高等教育工作按学科和院校单位构成纵横交叉的模式；高等教育的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范和价值观，形成学术信念；又从工作组织及其伴随的信念产生各种权力关系。学科和院校单位通过国家、市场和学者的协调形成复杂的学术系统。

高等教育中社会价值观的冲突需要进行调整，权力要分享，变革要支持，模糊性合法。全书观点和方法新颖，材料丰富，分析深刻，颇多独到见解，可供我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参考和评析。

本书由我和我的三位学生一起合作翻译，是我们承担的国家教委“八五”教育科学规划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的阶段成果之一。全书翻译工作于1992年完成。经协商，原书著者克拉克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代表丹·迪克森先生同意出版中文版，并放弃出版中文版的版税；泰国公共福利和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著名华裔专家、实业家周光荣博士慷慨捐资，在杭州大学设立光荣比较教育基金，为本书提供了资助。所有这些，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谨对克拉克教授、迪克森先生和周光荣博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王承绪

1993年11月8日

致 谢

我为写这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先后达 10 余年,对很多国家的学者和官员给予的帮助,谨致深切的谢意。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意大利的布鲁诺 (Sergio Bruno),吉格里奥利 (Pier Paolo Giglioli) 和其他意大利同事帮助我探索欧洲大陆高等教育系统的意大利变种,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使我大开眼界。在随后的年代里,我又受到国内外很多朋友有关其他许多重要国家高教系统的指导:特别是范德格拉夫 (John H. Van de Graaff) 和戈德希米特 (Dietrich Goldschmidt) 对联邦德国;盖格 (Roger Geiger)、帕尔默 (R. R. Palmer) 和弗斯 (Dorotea Furth) 对法国;普伦福斯 (Rune Premfors)、欧斯特格伦 (Bertil Ostergren) 和卢因 (Olof Ruin) 对瑞典;贾尔斯 (Geoffrey Giles) 对民主德国和南斯拉夫;勃达尔 (Robert O. Berdahl)、琼斯 (David Jones)、柯根 (Maurice Kogan)、莫迪 (Graeme C. Moodie)、麦金托希 (Naomi McIntosh) 和珀金 (Harold Perkin) 对英国;谢斐尔德 (Edward Sheffield) 对加拿大;天野郁夫、肯命斯 (William Cummings),喜多村和之,潮木守一和威勒 (Donald F. Wheeler) 对日本;列维 (Daniel C. Levy) 对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以及怀德海 (John Whitehead)、麦肯那 (Jon Mckenna) 和霍尔 (Peter Hall) 对美国。从阿什比勋爵 (Lord Eric Ashby)、本大维 (Joseph Ben-David)、勃恩 (Barbara Burn)、寇尔 (Clark Kerr)、珀金斯 (James A. Perkins) 和特罗 (Martin A. Trow) 的比较教育著作,我学

习了很多，不是本书所能充分致谢的。

1973—1974 年和 1979—1980 年间的经验，鼓励我写这本比较教育著作。当时我担任耶鲁大学社会和政策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在这个志趣相投的环境里，以上提到的一些人作为博士后研究员或访问学者参加研究工作。回忆起来，我们在高教研究室 1973—1974 年第一次研讨会上对于如何分析各国高等教育制度知道的多么少，而六年以后我们掌握了多么多的经验性资料的比较的能力，使我感到很大满足。米勒 (John Perry Miller) 和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Lindblom) 在担任社会和政策研究所所长期间给我提供了重要资助。我感谢他们和研究室的 10 多位研究人员，他们在那些年代非常积极地参加研究工作。我希望这本书被看作利用我的同事们实地调查研究所写的许多专门工作报告和专题著作的基本总结。

除了耶鲁大学的资助以外，美国科学基金会、全美教育协会、李列 (Lilly) 基金会、梅隆基金会和 Exxon 教育基金会历次的补助，使广泛的研究和不断的研讨会成为可能。我特别要感谢李列基金会负责教育的副主席庞霍尔特 (Laura Bornholdt) 连续四年热情资助研究。我也非常愉快地记起 1980 年夏由洛氏基金会资助，在意大利培拉吉奥 (Bellagio) 的赛别洛尼别墅的像乌托邦的环境中渡过一个月的时间，修改本书的主要章节，使我相信可以写一本完整的专著。最后，我要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研究院使我能完成手稿并定稿。近代研究性大学给学者的自由和资助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

一些同事对本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评论，他们是：勃恩、赤里奇 (Ladislav Cerych)、盖格、柯根、列维、梅叶 (John Meyer)、普伦福斯和陆德斯 (Gary Rhodes)。最后两稿的打字稿是台维斯 (Carolyn Davis) 和阿勃拉姆斯 (Jeannie Abrams) 完成的。

阿黛尔·克拉克夫人 30 多年来对我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把这本书献给她还不足以表示适当的感谢。

伯顿·R. 克拉克

于加州圣·莫尼卡

1981 年 11 月

很少能找到一种机构，既是那么统一，又是那么多
样；无论它用什么伪装都可以认出；但是，没有一个地
方，它和任何其他机构完全相同。这种统一性和多样性
构成大学是中世纪生活的自发产物的程度的最后证明；
因为只有活的东西才能这样尽管充分保持它们的个性，
同时使它们自己服从和适应形势和环境的全部变化。

录自埃米尔·涂尔干：《教育思想发展史》

目 录

伯顿·R. 克拉克教授为《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 跨国研究》中文版作的序.....	(1)
译者序.....	(1)
致 谢.....	(1)
导 言.....	(1)
第一章 知识	(11)
第一节 知识材料和群体	(11)
第二节 目的的自然模糊性	(18)

第一编 组织的要素

第二章 工作	(33)
第一节 学科和院校	(33)
第二节 分裂的专业	(39)
第三节 院校的分工	(41)
第四节 学术系统的划分	(57)
第五节 学术组织的松散网络	(73)
第三章 信念	(83)
第一节 学术信念的基本类型	(86)
第二节 作为中介缓冲器的信念.....	(109)
第三节 象征的整合.....	(111)
第四章 权力.....	(120)

第一节	权力的层次·····	(121)
第二节	学术权力的形式·····	(123)
第三节	各国权力分配的模式·····	(137)
第四节	作为权力系统的学术系统·····	(143)

第二编 整合和变革

第五章	整合·····	(153)
第一节	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	(154)
第二节	整合的过程·····	(162)
第三节	利益集团的控制·····	(186)
第四节	国家控制的限度·····	(192)
第六章	变革·····	(203)
第一节	结构倾向和适应能力·····	(208)
第二节	有序和无序的矛盾·····	(229)
第三节	分化的过程·····	(239)
第四节	国际移植·····	(253)
第五节	知识和变革·····	(261)

第三编 规范理论

第七章	价值观念·····	(271)
第一节	基本价值观念·····	(272)
第二节	冲突与妥协·····	(284)
第八章	先后主次·····	(299)
第一节	权力分散·····	(300)
第二节	支持多元化·····	(306)
第三节	无序的合理化·····	(310)
第四节	高等教育的独特性·····	(312)

导 言

在开发和传播世界智力遗产的人才中，有一大部分聚集在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知识中心，在培训专业人才和政治精英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它们在数量上成倍地发展，它们的活动成倍地增加，在 20 世纪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长期以来，学者们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自己的职责。尽管在经济、政治组织以及如社会阶级等领域提出了很多学术观点，但是大学的教授们或退休的校长们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动只是偶尔有所评论。1960 年以后，高等教育的扩展问题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不满引起了公众和学者的极大注意，但是所采取的方式是分散的、脆弱的。研究的课题集中在政府和其他资助者寻求解答当时问题时的即时的问题和事件。学生政治行动的戏剧性事件引起很多评论，但是很少留下重要的文献。当大家的注意力显得新鲜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国家一些持有新观点的学者进行高等教育的研究，但都为时太短，很快就搞不了；组织理论家凝视一会大学的古怪工作方式，然后就回到商号去了；政治学家收集几篇有关政府和高等教育的论文，然后就回到传统的政治机构去了；经济学家计量一些投入和产出并推测收益和成本，然后就为他们的研究工具寻找其他题目了；社会学家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注意教育，而忘却其他问题。此外，很多研究局限在一个国家，但是另一方面随意地用来断言无论哪里学术生活是什么样子，连续的比较分析留给少数人去做。因此，尽

管在观念和事实方面显得更加丰富，但是，涌现的有关高等教育的重要文献还是有許多有待改进。

我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地详述高等教育如何组织、如何管理以改进高等教育的研究水平。方法有两方面：一是从组织的观点来看，阐明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二是表明那些特征在各个国家之间如何变化，有何重大影响。要确定要素就是要建立一般的范畴。以经验为根据体现这些范畴，就要吸收诸如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高等教育的描述和分析，在这些国家已进行着最好的研究工作，同时，可能的话，再加上诸如波兰、墨西哥和泰国等各种各样国家，如果可以得到一些可靠的和适合的资料。这两件工作都是彼此必需的。要确定什么是基本的要素，要求我们到各国去开展工作，面对他们共同的和各自不同的结构和程序。把各国描述性的事实集合起来，不同于单纯的目录，需要有一个有序化的框架。在揭露我们仅仅研究一个国家、通常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时控制我们视力的独特的特征和无意识的假说方面，跨国比较是特别有利的。“家乡”观念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特别有害，因为大量文献是美国人写的，而美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一个不正常的案例。再者，各国之间差异的残酷的现实限制着规范性的教条。在对国内外的高等教育应该怎么办作出判断以前，了解什么是目前的处境，从而如何为和我们同样具有推理能力的别的国家预示未来，这是有意义的。

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就是集中研究这个系统本身是怎样决定行动和变革的。这种内部的研究方法可以由此避免容易把影响归罪于“社会”。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也越来越使人非相信不可，社会科学的很多部门分裂成具有它们自己的约束力和规则的主要专业。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说得好：“人类活动的某些领域已经发展了它们自己的行动模式：科学世界或绘画世界。换言之，有部门霸权这样的东西。”^①例如，科学、学术和高等教育

具有初等教育或近代中等教育中所想象不到的自主权。它们比较摆脱了家庭、社区和教会，并且在极大程度上比较摆脱了地方官员和地方外行人的控制。在上一个世纪，已经看到高等教育系统成熟，作为近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

尽管有流传比较广的印象，认为高等教育越来越和土会其他部分相互依存，因而严重地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看到高等教育部门已经发展了它自己巨大的结构和有界限的程序，可以对某些任务和职能提供一些绝缘作用和强化的盟主地位，还是有益的。^②高等院校的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各集团在系统内部形成它们直接的工作环境的力量，还包括影响世界的力量。接近本世纪末，物理学家已经利用了原子能，数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发展了电脑，生物学家已经在遗传工程作出他们自己的革命性进展，这一点几乎无需另外给予支持。所涉及的是学术活动的大量专业化，这一根本趋势使人们扎根在工作的领域里，他们在这里接受了长期的高级训练，从这里取得物质的和象征性的报酬。在近代世界，专业化的职业在有组织的部门安家——林务人员在森林机构，税务人员在税收机构和有关的财政机关——在他们“自己”的部门决定性地表现自己，并且利用他们“自己”的组织作为和其它利益斗争的工具。当专业化和官僚化结合起来形成巨大的组织和更大的部门时，从而产生强有力的社会行动者。在高等教育，情况就是这样。

从高等教育内部进行研究的观点还具有强调机构反应的优点。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观察家们常常注意显然在别处提出的“需求”，变成或者推动整个系统，或者由于消极的没有动作而被拒绝的力量。但是任何可以辨认的需求只是分析的开端。对需求的反应是什么？需求是怎样贯彻和形成的？实际上，系统首先决定需求到什么程序？因为当长期存在的严格标准使90%的中学生完全明白，他们休想接近高等教育系统的大门。甚至在发起一些新的组织形式和早期发展阶段，如果我们要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

区分开来，需要进行很多内部的分析。

英国历史家科班（A. B. Cobban）出色地分析了在中世纪欧洲最早创办大学时的斗争，他们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Bologna）及其模仿者幸存下来，而在萨莱诺（Salerno）的更早的和同样有前途的努力却消失了。他指出：“萨莱诺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发展一个保护性的和有凝聚力的组织以维持它的智力活动的发展。”考朋总结说：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迅速作出制度上的反应。缺乏固定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究提供机会，但是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构架才能得到。^③

我将大力推动研究高等教育内在本质的观点，集中研究制度上的构架，就是支持、维系，实际上有助于创造“智力活动契机”的正规组织。

隐藏在本研究和其他很多有关社会科学和教育的研究的许多困难的背后，是“系统”这个隐晦的名词。我们被这个概念的模棱两可和变化不定的意义所困扰，我们又不能不使用这个概念。当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我们构筑种种界线，任意规定组织内部的人和外部的人有关行动者和结构的各种定义。一个经济系统就是从事商品和服务交换的行动者的团体，连同他们使用的各种制度上的方式，但是当他们从事其他活动时，他们就在系统之外。一个政治系统可以既包括关心政治的积极分子，也包括那些仅仅偶而投票的人，但是，除非这个名词和在政治组织中存在意义相同，那些倾向非政治活动的人明显地不在系统之内。高等教育系统（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也是如此。有时我将以狭义和传统的意义使用这个名词，指一个正规的实体的集合体，例如，法国高等教育系统被看成许多大学、学院和研究所的总和，连同如教

育部这种显然正规的机构。但是，如果上下文明确，有时我将转到比较广义的高等教育，包括从事中学后教育活动的任何人员，不论是管理人员、组织人员、工人，还是消费者。例如，专任的或兼任的行政人员、教授和学生以及立法机关的教育委员会，关心高等教育问题的行政官员和行使董事职责的董事会成员都包括在这个广义的用法之内。

这种关于系统的比较松散的定义是必要的，它意味着高等教育系统的界线，越过时间和空间，蜿蜒曲折，有时扩大，有时收缩。要是不这样做，就会把有些高教系统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机构置于“系统”之外。如果我们适当地把大学的董事包括在英国高教系统之内，我们是明确地指他们生命中关心高等教育事业的那一部分，虽然我们了解他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其它事务。因此，把某些外部利益的代表人物作为其它国家高教系统的一部分，例如本书后面讨论的瑞典各阶级合作的模式，他们在各种委员会中占有固定的位置，这也是适合的。当有助于分析和说明概念时，我将自由地扩大系统这个概念的界线。

对于系统的放宽的研究方法还可以更好地适应学术任务和工作的特点，各学科和专业领域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和他们在其他大学和其它国家的高教系统的同行挂钩联系成为我们分析的中心，这样使界线不稳定和成问题。此外，在很多国家，教授兼任是正式的，他们在其它地方任职是合法的，所以他们徘徊于高等教育内外，在整体上，他们被松散地划在高等教育界线以内。所以，在分析的时候，给系统灵活地指定界线，较少地为是否有界线操心都是有利的。组织理论使组织和它们环境的关系概念化的努力已发展到建议我们“尽可能取消组织及其环境之间的界线”，以便“按自己的目的采用组织内的群体和组织外的群体的术语”。^④这个观点对一大批组织甚至更为适合。随着系统的界线那么成问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位置确定的